

# 互动行为与选民动机

## ——一项关于选举的定量研究

高 勇 雷 弢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101)

【摘 要】本文通过对北京市区县人大代表选举的一项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人大代表与选民的互动将会显著地影响到选民投票的积极型动机比例。因此,应当有制度保障来确保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的互动,以提高选民的参选热情,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趋完善。在方法上,本文揭示了在根据观察数据进行因果推论时普遍存在的“隐性偏误”问题,并介绍了一种解决办法,即基于“倾向得分”而进行的配对方法。

【关键词】选举制度 参选动机 隐性偏误 倾向得分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0)01-0078-05

### 一、引言与研究说明

投票选举人民代表是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最神圣的基本权利,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也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政治参与形式。投票行为因此成为我们观察群众有序进行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最好窗口。对于基层人大选举现象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但是研究成果中定性研究居多,定量研究较少;而在定量研究中,又多集中于投票率的研究,对于投票过程中选民动机的积极性的研究不足。事实上我们不能否认投票者部分持有消极的投票动机,如“例行公事”、“随大流”等。只有在确保投票率继续保持高比例的同时,不断地提高选民中积极型动机的比例,才能更好地促进我们民主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挥。

影响选民动机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代表(包括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互动程度。信任很大程度上并非完全来自于抽象的制度设计本身,或者来自于普遍的道德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它来自于切实的人际互动。<sup>[1](P481-510)</sup>对于选举制度的信任和认识同样如此,只有选民切实地与代表及候选

人之间存在着互动,选民才能够真正体会到选举制度对于自己的重要性,以及自己在选举过程中发挥的主体性作用。然而,代表与选民的互动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选民动机的积极性?在这一方面是否有确凿的证据?本文试图通过实际的调查数据来回答上述问题,为中国基层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经验研究的基础。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市选民选举心态和参与行为再研究”课题调查。调查于2006年北京市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日(2006年11月8日)后一个月(12月8日)开始,为期一个月(2007年1月8日)结束。调查对象均具有北京市户籍,年龄在18-70岁之间。样本按照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法抽取,具体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北京市所有区县的街道和镇的抽样框中一次性随机抽出57个街道(乡镇);第二阶段再从每个抽中的街道(乡镇)中随机抽取一个社区或居(村)委会,共计57个社区或居(村)委会;第三阶段再从每个社区或居(村)委会等距抽取20位居民作为调查对象。最终获得了1140

收稿日期 2009-12-30

作者简介 1.高勇(1976-),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 2.雷弢(1951-),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变迁中的民主、民权和民主问题。

基金项目:“北京市选民选举心态和参与行为再研究”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课题负责人为雷弢研究员。

份有效问卷,其中非农户口 957 人,农业户口 183 人。其中有 726 名回答人亲自参加了投票,他们就是本文关注和分析的对象。从事后的数据质量检验来看,数据的可靠度是比较高的。

## 二、研究背景 对政治参与问题的讨论

我们长期以来强调选举的功能在于“选贤任能”。但是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选举最重要的意义,可能还不仅仅在于选了张三还是王五,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选民都认真地投身其中,认真讨论、认真参与,这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公民教育过程,是一种效果无可比拟的国民教育。在这样的过程中,个体与国家融为一体,公民的高尚情感油然而生。在这样的过程中,选民能更深入地体会到政治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权衡性,个体立场的局限性和偏激性得以克服,价值立场与实践操作得以结合。也就是说,选举的功能不仅仅在于选举结果,而且在于其选举过程。常常能听到许多说法,诸如“我们选民的素质还低,参与性不高,参与意愿不强,所以搞民主在中国是不行的。”然而,这里的因果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是因为选民素质不高,所以民主无法实行,还是因为民主没有被实行,选民得不到民主教育,故而选民素质不高?我们不得不客观地承认,这里两种因果关系都是存在的,都有其合理性。但是至少我们应当同样重视后者的逻辑,重视选举过程的社会意义——它是公民教育的最佳途径(尤其是基层选举)。

那么目前我们基层选举中的公民参与情况如何呢?从本次调查数据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信息。1140 个被访者中有 726 人亲自参加了换届人大代表投票选举,亲自投票率为 63.7%。以 95% 置信区间来估计,估计下限为 60.9%,估计上限为 66.5%。可以讲,这一结果并不十分令人乐观。亲自投票率仅是测量选举参与程度的一个指标,另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指标是参与投票者中持有积极型动机者的比例,即从“选民动机”的角度来看参与情况。本次调查数据显示,亲自参加了基层人大代表投票的 726 人中,为了“选出真正代表民意的人大代表”而参加投票的占 30.2%,表示只是“例行公事,行使自己权利”的占 35.3%,表示仅仅是“随大流、什么都没想”的占 31.1%,表示“不去不行,只好去了”的占 3.4%。从“选民动机”的角度来看,基层选举中的参与情况仍然有待提高。

那么如何去提高选民的积极性,充分吸引他们积极参与到基层选举过程中来?选举与民主从来就不仅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充满了细节的制度设计过程。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

看,可以有多个入手点,如投票前对候选人的提名与确定;投票过程中对候选人的认知与了解;投票后选民与代表的互动联系等。有研究者提出,应当“重点改革候选人提名确认方式,先易后难地推进基层选举改革”,<sup>[2](P262-265)]</sup>而本文则力图从另一个点入手,用数据资料来说明投票后选民与代表的互动联系将对之后选民的参与动机产生影响。只有进一步密切选民与代表的日常联系,方可使基层选举制度发挥出其应有效能。

## 三、粗略的两因素分析:互动程度与选举动机

如何来测量选民与代表的互动程度呢?我们是从两个指标来入手的:(1)选民在过去三年中是否见过本选区选出的上届人大代表?(2)选民能否回忆起上届人大代表为本选区居民提过提案或办过实事?

如何测量选民参选的积极性呢?我们在此只是粗略地根据其动机分为两类:(1)投票动机为“希望选出真正代表民意的人大代表”的选民,我们将其定义为具有积极型投票动机的选民;(2)投票动机为“例行公事,行使自己的权利”、“随大流,什么都没想”、“不去不行,只好去了”等的选民,我们将其定义为消极型投票动机。

根据某个互动程度的指标,可以把所有调查人分为两组,比较两组中的积极动机率,就可以粗略地估计出选民与代表互动程度对于选举的积极动机的影响。例如,按照“过去三年中是否见过人大代表”就可以把选民分为两组。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出,过去三年中见过人大代表的选民中有 53.77% 持有积极型的投票动机,而没有见过人大代表的选民中只有 26.13% 持有积极型投票动机,因此见过人大代表的选民中积极型投票动机的比例就比没有见过人大代表的选民高出 27 个百分点( $53.77\% - 26.13\% = 27.64\%$ )。同理,从表 1 中我们可以推算出,记得代表提案的选民中积极型投票动机的比例比不记得提案的选民也要高出 27 个百分点( $53.39\% - 25.66\% = 27.73\%$ )。

表 1 代表与选民互动程度对于选民选举动机的粗略影响

	是否见过人大代表		是否知道代表的提案	
	见过	未见过	记得	不记得
积极动机率	53.77%	26.13%	53.39%	25.66%
N(总人数)	106	620	118	608
比例差值	27.64%		27.73%	

由此,我们可以粗略地估计出代表与选民互动程度对于选民参选积极性的影响:无论是哪一项互动程度的指标,都可以使得选民中积极动机的比例提高 27 个百分点左右。这说明了代表与选

民互动程度在民主制度设计中的重要性。

四、上述推论中存在的漏洞 隐性偏误的存在  
通过简单的比较,我们得出了前述结论。但是只要略微仔细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的逻辑漏洞。例如,通过数据比较,我们认为“过去三年中见过本选区的上届人大代表将使得选民的积极动机率提高 27 个百分点”,这一推论是建立在如下假设基础之上的:如果事实上没有见过人大代表的那些人见过人大代表,那么他们的投票动机将会表现得和那些事实上见过人大代表的人一样;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事实上见过人大代表的那些人没有见过人大代表,那么他们的投票动机将会表现得和那些事实上没有见过人大代表的人一样。

然而这只是一种假设。试考虑如下一种可能性:见过人大代表和没有见过人大代表的这两组选民的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能够见过人大代表的那些人都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人;这些人通常具有较高的政治效能感,即感到自己的行为可以积极地影响到决策结果,因此也就会抱有更积极的动机去参与投票;但是这里起关键作用的并不是他有没有见过人大代表,有没有与人大代表有过互动机会,而是他的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也就是说,即使他见不到人大代表,由于他的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他仍然会积极地去参与投票,而绝不会表现得同另外一组中的人一样。在上述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前面所作的分析就存在着一个非常严重的逻辑漏洞。除非数据是来源于严格的随机实验,否则我们就无法通过简单的比较来得出关于互动程度与选民投票动机之间关系的结论,至少前述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互动程度对于选民投票动机的影响能力。只要我们进行比较的两组人不仅仅在“是否见过人大代表”这一点上存在差异,而且在其他相关方面也存在差异,那么把他们投票动机上的差异单单归因于“是否见过人大代表”这一点就是不准确的,在这里存在着统计学上所称的“隐性偏误”(Hidden Bias)。

从数据来看,我们进行比较的两组之间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显著差异。以“过去三年中是否见过上届本选区的人大代表”为例,见过者和没有见过者两组在党员比例、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生活满意度等方面均存在着显著差异,而这些因素与选民动机之间可能会存在着比较强的相关关系。这就意味着我们前面得出的差异中可能包括了这些混杂因素所导致的结果,而不能完全归因于代表与选民之间的互动因素。从表 2 中我们可以看

出,一般而言,见过人大代表者这一组选民中的党员比例较高、高中及以上学历者较少、低收入者比例较少、对生活不满意者较少。

表 2 “是否见过人大代表”两组在一些基本变量上的差异

	党员比例	高中及以上学历比例	月收入在 1000 元以下者比例	生活不满意者比例
见过人大代表者	33.02%	60.38%	26.42%	21.70%
未见过人大代表者	9.84%	69.84%	34.35%	34.84%

但是除此之外,两组之间更为明显的差异表现在他们对于人大选举的一些认知态度上,而这些因素可能更直接地影响一个人是否持有积极动机去参加投票。我们共设计了六个问题来测量选民在选举中的主体性认识态度。(1)选民对于自身参与能力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我们设计了两个问题:是否同意“现在像我这样的人也可以影响政府政策”;是否同意“政治太复杂了,我们一般老百姓实在搞不懂”;(2)选民对于政治和选举的认同也决定着他的选举行动,这方面的两个测度是:是否同意“选举与我个人和家庭的切身利益越来越紧密”;是否同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党和政府的责任,与老百姓无关”;(3)选民对于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的赞同程度也是重要的变量,这方面的两个问题是:是否同意“人民代表大会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是否同意“每届人大选举直接投票都是走形式”。六个测量分别从三个方面一正一反测量了回答人对于选举的认知态度。这三个方面可以与社会学者将行动者的主体性划分为能力主体、权利主体、认同主体的分类方法相对应。<sup>[3](P38-45)]</sup>

那么,以“是否见过人大代表”而分成的两组选民在上述问题上的态度如何呢?表 3 列出了结果。结果与我们的预期是大致相符的,两组选民在态度变量上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总体而言,见过人大代表者无论是在对自身参与能力的认识上,还是在政治和选举制度的认同上,以及对于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的赞同程度上,都要比

表 3 “是否见过人大代表”两组在态度变量上的差异

	“现在像我这样的人也可以影响过政府政策”的同意比例	“政治太复杂了,我们一般老百姓实在搞不懂”的同意比例	“选举与我个人家庭的切身利益越来越紧密”的同意比例
见过人大代表者	32.08%	27.36%	68.87%
未见过人大代表者	23.06%	63.6%	52.42%
	“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与老百姓无关”的同意比例	“人民代表大会在社会生活中作用越来越大”的同意比例	“每届人大选举直接投票都是走形式”的同意比例
见过人大代表者	28.30%	77.36%	42.45%
未见过人大代表者	49.52%	70.32%	69.68%



没有见过人大代表者的另一组积极得多。这就使得我们更加确信,这两组选民在投票动机上的差异是不应单单归因于“是否见过人大代表”这一点,差异中可能包括了两组选民在一系列人口变量以及在对于选举的态度变量的效应。如果不能设法排除掉这些变量的效应影响,我们就不可能准确地测量出代表与选民互动对于选民参选动机积极性的影响大小。

同样,以“是否知道代表的提案”分类的两组在这些重要的人口变量和态度变量方面也具有明确的差异,这些差异同样影响到了我们前述推论的准确性。由于文章篇幅的原因,这里不再一一列出以“是否知道代表的提案”分类的两组在这些变量上的差异程度。

五、配对比较 排除了混杂因素之后的结果

以上分析揭示出了我们在进行因果分析时会遇到的一种困境,那就是因果分析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假设,因为因果陈述从根本讲就是一种反事实陈述。<sup>[4][P45-48]</sup>我们想知道的不仅仅是现实中见到人大代表的选民和没有见过人大代表的选民在动机的积极性上有多大差异,而是如果那些没有见过人大代表的选民在见到人大代表之后,他们的动机积极性会有多大提高。但后面的问题是建立在虚拟的假设情境下的,除非确信两组人群在其他背景因素上都是完全相同、具有可比性的,否则我们就无法通过简单的数据比较来获得答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更为有效的排除那些混杂因素的效应,较为准确地估计出代表与选民的互动对于选民参选动机积极性的影响程度呢?一种很直观的思路便是,我们最好能够使两组选民在人口变量和态度变量上都尽可能一致,然后再来比较他们在投票动机积极性上的差异。<sup>[5][P67-91]</sup>以“是否见过人大代表”为例,我们的数据中共有 106 人见过人大代表,我们称之为 A 组;有 620 人没有见过人大代表,我们称之为 B 组。A 组与 B 组在诸多背景因素上存在差异,但我们可以从 B 组中挑选出与 A 组背景因素基本一致的 106 个个案,形成新的一组,我们称之为 BM 组。由于 BM 组在背景因素上是与 A 组基本一致的,故而我们便可以通过直接比较得出结论。

那么问题的关键便是如何从 B 组中抽取背景因素与 A 组基本一致的 BM 组来。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涉及到的背景因素包括党员比例、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生活满意度以及六个态度变量,由于包括如此多的背景变量,从 B 组抽取 BM 组将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统

计学家罗森邦和鲁宾提出了一种便捷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背景变量信息汇总为一个单一的“倾向得分”(Propensity Score),然后根据“倾向得分”值来从 B 组中抽取与 A 组配对的 BM 组。<sup>[6][P41-55]</sup>在本例中,我们可以利用 logit 模型来得到每个个案基于所有背景变量信息下“见到人大代表”的预测概率值,这一预测概率值就是所谓的“倾向得分”,它的取值在 0-1 之间。具有相同“倾向得分”的个案可以近似地认为他们具有着相同的背景变量。近年来已经有中国学者将这种方法应用于自然科学的统计分析中,<sup>[7][P561-569]</sup>但是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还相对较少。对于“倾向得分”及其配对方法的具体技术性讨论并不是本文的重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相关文献。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通过基于“倾向得分”的配对方法,我们就可以从 B 组中抽取出一个与 A 组配对的 BM 组。

仍然以“是否见过人大代表”为例,数据中,共有 106 人见过人大代表(A 组),有 620 人没有见过人大代表(B 组)。我们利用上述方法从没有见过人大代表者中抽取出了 106 人(即新的 BM 组),以便与见过人大代表者进行比较。A 组与 B 组在许多背景变量上都存在着显著差异,那么 A 组与 BM 组在这些背景变量上的差异情况如何呢?表 4 和表 5 分别列出了 A 组与 BM 组在 4 个

表 4 A 组与 BM 组在一些基本变量上的差异

	党员比例	高中及以上学历比例	月收入在 1000 元以下者比例	生活不满意者比例
见过人大代表者(A 组)	33.02%	60.38%	26.42%	21.70%
配对的比较组(BM 组)	35.85%	64.15%	25.47%	20.75%

表 5 A 组与 BM 组两组在态度变量上的差异

	“现在像我这样的人也可以影响过政府政策”的同意比例	“政治太复杂了,我们一般老百姓实在搞不懂”的同意比例	“选举与我个人家庭的切身利益越来越紧密”的同意比例
见过人大代表者(A 组)	32.08%	27.36%	68.87%
配对的比较组(BM 组)	27.36%	27.36%	66.98%
	“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与老百姓无关”的同意比例	“人民代表大会在社会生活中作用越来越大”的同意比例	“每届人大选举直接投票都是走形式”的同意比例
见过人大代表者(A 组)	28.30%	77.36%	42.45%
配对的比较组(BM 组)	32.08%	74.53%	46.23%

基本人口变量和 6 个态度变量上的差异情况。

从表 4 和表 5 中,我们可以看出,经过“倾向得分”配对而后得到的比较组 BM 与 A 组之间在这些背景变量上是十分相似的。比较 A 组和 BM 组选民中的“积极动机比例”,就可以近似地得到“见过人大代表”对于选民积极动机比例的真实影

响程度。

A组中的积极动机比例为53.77%，而BM组中的积极动机比例为41.51%，因此我们可以大致认为“见过人大代表”可以使得选民中的积极动机比例增加12个百分点左右（ $53.77\% - 41.51\% = 12.26\%$ ）。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用“倾向得分”配对的办法估算出“是否知道代表提案”对于选民积极动机比例的影响程度。“知道代表提案”可以使得选民中的积极动机比例提高14个百分点左右（ $53.39\% - 38.98\% = 14.41\%$ ）。由此可见，代表与选民的互动对于选民积极动机比例的提高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在没有通过配对排除两组之间的混杂因素时所得到的结论无疑是过分地夸大了这种效应。

#### 六、进一步的讨论

选民的投票动机是基于“真正选出代表民意的代表”还是仅仅作为一种“例行公事”，这对于民主制度的实施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到选民投票动机的因素也是复杂的，但本文集中关注一项内容——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的互动。如果选举结束之后，选民几乎再也见不到代表，几乎再也了解不到他的提案与行动，那么选民就可能降低对于选举的热情，更可能把选举作为一种“例行公事”而不是“选出真正代表民意者”的过程。选民必须在选举过程和日常经验中体会到自身在政治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才能提高自身的政治效能感，提高自己对选举制度的信任程度。本文用经验数据证明了人大代表与选民的互动将会显著地影响到选民在选举中的动机，具体而言，“选民见过上一届的本选区人大代表”和“选民知道上一届人大代表的提案”都会使得选民的积极动机率提高12到14个百分点。我们在实践工作中或许应当考虑更多地增加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的互动，去让选民了解人大代表本身和他们的行为，应当提出一些制度来确保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的互动。唯有这样，才能提高选民的参选热情，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趋完善。

在分析方法上，本文揭示出了通常在进行组间比较时由于存在混杂因素而导致的“隐性偏误”问题。在根据观察数据进行因果推论时，这样的“隐性偏误”往往是普遍存在的，但很少能够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这将使得研究者往往过分夸

大所研究事件的作用。如果要使结论更有说服力而避免误导性，研究者就必须更为小心地警惕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隐性偏误”问题。基于“倾向得分”而进行的配对方法是一种解决“隐性偏误”问题的有效办法。这种方法通常能够有效地解决部分混杂因素的影响，使研究者得出更为接近事实的答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基于“倾向得分”而进行的配对方法也并非十全十美，它只能基于某些背景变量而进行配对，如果这些变量并没有能够涵盖两组之间的主要背景差异，那么这种方法很可能就是无效的了。此外，这种配对方法只利用了那些能够配对的个案，而损失了那些无法配对的个案中包含的信息，这也是它的一大缺点。但是总体而言，基于“倾向得分”而进行的配对仍然不失为解决“隐性偏误”问题的有效方法。

注释：

①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2004年关于合并乡镇级和区县级人大代表选举活动的决定，北京市提前于2006年11月8日进行新一届区县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活动。此次选举距上一届2003年北京市区县人大代表直接选举投票日正好三年时间。

②另一种思路是使用多元回归方法来控制混杂因素的效应。关于多元回归方法与倾向得分配对方法的各自优劣，可参见参考文献[5]。一般而言，倾向得分配对方法比多元回归方法所需要的假定更少，因此在技术上更有优势。

参考文献：

- [1]Granovetter,Mark.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481-510.
- [2]雷弢.参与的逻辑：北京选民选举心态与参与行为追踪研究[M].香港：晨钟书局，2009：262-265.
- [3]沈红.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8-45.
- [4]Lieberson,Stanley.Making It Count: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Research and The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45-48.
- [5]Zanutto,Elaine L. A Comparison of Propensity Score and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mplex Survey Data[J]. Journal of Data Science 2006,(4):67-91.
- [6]Rosenbaum,Paul R. and Donald B. Rubin.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J].Biometrika 1983:41-55.
- [7]赵守军，张勇，汪萱怡，高燕宁.均衡组间差异的有效方法：倾向评分[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3,(6):516-519.

(编辑：刘晖霞)

(9)

###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60-year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Rural Area in A Rural sociology Pespective

Lu Yilo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China's Rural area witnessed a great change in the past 60 years, in which there were full of successes, setbacks, developments and underdevelopments. In the first 30 years, why the farmers's life were changed successfully is because the institutions were founded to guarantee both the rights of farmers and govern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llective movement" damaged th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 in the same time. In the second 30 years, the success of reform is based on unstraining the farmers to go out to find a new life in urban area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raining of rules that hold up the farmers to go into urban areas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s of rural area.

**Key words:** Development; Underdevelopment; Rural Establishment; Rural Sosiology

(10)

###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ffect of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Poverty-stricken Population by the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Li Hanzong<sup>1</sup> He Zhaiping<sup>2</sup>

(1.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2.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data of 528 urban poverty-stricken population which have been sampled and surveyed in Tianjin, we find that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poverty-stricken population have no effect on the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1) gender, age or occupational level does not affect the network size and network heterogeneity; (2) educational level don't affect the network size, network relations constitution, network homophily, and network heterogeneity; (3) marital status does not affect the network size, kinship relationships and network heterogeneity; (4) personal income does not affect the network size, relations constitution the network size and network homophily; (5) the effect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variables are not significant in many else areas.

**Key words:** Social Support Network; Urban Poverty-stricken Population; Network Structure

(11)

### Interaction and Motivation: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Voting Behavior

Gao Yong Lei Tao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By analysing an survey data on voting deputies of for County People's Congress, we find that Interactions between representatives and voters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voting behavior of voters.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assu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presentatives and voters is crucial. In methodology, hidden bias often cause misleading conclusion in causal deductions; the matching method based on propensity score is an ideal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Keywords:** Voting Institution; Voting Motivation; Hidden Bias; Propensity Score

(12)

### The Injury Dilemma, Interest Articulation and the Plight of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of China's Migrant Workers: An Exploratory Study Based on the Survey on Pneumoconiosis of A Small Coal Mine in G Province

Zhang Hui

(Guizhou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04, China)

**Abstract:** Through researching the migrant workers' working condition and its concerned problems in a small coal mine in G province of China, this article discusses major factors which result in the injury dilemma, interest articulation and the plight of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We holds the opinion that the macroscopic international and home industry pattern arrangement, capital logic, local authority's action choice, migrant workers' local knowledge, trade unio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role statuses have molded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pneumoconiosis generation and the plight of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of migrant workers. Eventually, we put forward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proposals about more next researche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Pneumoconiosis; Interest articulation;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